

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

作者：章开沅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11-10 14:56:00

也许由于好奇乃是人之天性，一般来说，异域与异质文化之间，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尽管彼此并不会的巨大转型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

在18世纪，与中国对于西方的淡漠态度正好相反，欧洲却通过耶稣会教士带回的一鳞半爪，对中国武器、丝绸、刺绣、轿子、轿式马车，乃至折扇、绢扇和手绘墙纸，成为法国、德国宫廷和上层社会的时尚趣味”。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一些决心冲破中世纪黑暗的思想先驱，力图从遥远的中国文化中寻求革新。即曾指出：“欧洲的王室与商人，仅知在东方寻找财富，而哲学家则于此发现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该赞美、惭愧，尤其是应该模仿”。

这股“中国风”对于此后的法国大革命究竟具有何等影响？我们自然难以作过高的估价。但法国大革命却对百余年后中国的辛亥革命产生过明显影响，本文就是试图从这个角度作初步探索。

—

18世纪的中国，从总体上来说，对于遥远的西方世界是相当冷漠的，而冷漠则产生于隔绝与无知。欧洲，乃至影响于美洲、非洲，但却对其时的中国并无任何触动。

直至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惊醒了中国，人们开始瞩目外在世界，而首先是着力了解西方。但在最初生在法国的大革命，在中国人的“世界”中还缺少应有的位置。

影响甚大的魏源《海国图志》，以大量篇幅介绍英国，民主则推重美国，并且视瑞士为“西土桃花源”。

如果说，魏源从未走出国门，对外在世界的了解难免缺失，那么，此后曾经漂洋过海亲履欧洲大陆作答的声调仍然是低沉的。曾经先后出使法国的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连同曾任驻法参赞的黎庶昌，者则把小国瑞士看作“无君臣上下之分”的理想国。尽管他们都肯定西方的议会政治，但却只称赞“英、德“叫嚣之气过重”。（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在这些入述奇”知名的外交官张德彝，特别是他第四次赴法逗留近一年之久；但在他的有关记述中，也只介绍拿破社，而对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却很吝啬笔墨。

可以说，有很长时间，中国人（包括先进分子）对法国大革命是很隔膜的，这种情况要到甲午中日战

1898年，康有为为了推动维新变法，向光绪皇帝进呈《法兰西革命记》，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法国大革命样，却以法国为鉴戒，即以法国革命之酷烈来恫吓清廷，敦促皇帝尽快变法。

在康有为的笔下，法国大革命是一幅惨绝人寰的恐怖画卷。他为《法兰西革命记》写的序言如此描述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国中，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家，千万之中人，骨暴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城市为墟，而变革频仍，迄无安息，漩入回渊，不知断头之台，空洒国民之泪，凄恻千古，痛感全球。自是万国惊心，君民交战，革命之祸，遍及全欧，波乃有若近世革命之祸酷者矣，盖皆自法肇之也。”这就等于说法国大革命是世界各国革命灾难蔓延的罪魁祸首

但是，康有为又不得不承认民权与革命是时代的发展趋势，因而人力也就难以阻遏。所以序言又说：法国革命而来，迹其乱祸，虽无道已甚，而时事所趋，民风所动，大波翻澜，回易大地，深可畏也。盖大

康有为认为，对于民权与革命的潮流，不宜简单粗暴地加以堵截，只能因势利导，最好是走英国君主敌众，私不敌公，人理之公则也，安有以一人而能敌亿兆国民者哉！则莫若立行朝断，不待民之请求迫然。明定宪法，君民各得其分，则路易十六必有泰山磐石之安，聃彭之寿，尧、舜之誉，生死哀荣，国家的文字和言论，诚然扭曲了法国大革命的形象，但却也或多或少透露了这次革命的积极意义。

在戊戌维新诸君子当中，对法国大革命评价最高而个人气质又最接近于法国革命志士的只有谭嗣同——“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夫法人之学问，也。”（《仁学》卷下。）他给老师的一封信也断言：“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疆师书”三，《谭嗣同全集》，第303页。）及至戊戌变法失败，他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对劝其走避的友者，谁鼓士气？自古至今，地球万国，为民变法，必先流血。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流血传》，《知新报》第75册。）这种英雄气概，较之法国当年那些英勇就义的前辈，丝毫不逊色。但谭嗣大革命时期法国人民的水平，因此，“与中国最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仁学》卷下。）由于

中的主张与实践，毕竟未能超越那一代先进中国人的水平。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对中国影响甚微，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人势。直到19世纪末年，作为维新变法的主要推动者，无非是一群刚刚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半新半旧的知乏足够的新兴社会中坚力量作为依托，因此他们便不敢直接效法法国大革命的榜样。

君主专制主义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自然经济、宗法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宗法思想异常根深蒂固延伸形成的“定于一尊”与“大一统”思想，在中国长期被视为天经地义。与近邻日本也不尽相同，“至始终是稳定国家秩序的中心，是人们心目中不可侵犯的神圣。因此，否定与抗拒君权的造反（革命），历期的先进中国人，仍然未能完全摆脱这种传统思想的束缚，他们既要争取若干民主权利，又不敢从根本上英、日为榜样而以法国为鉴戒。变更这种相对稳定的心态，需要有更长的时间与更大的推动力量。

当然，不能把康有为等人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以至否定统统视为反动。因为，他们毕竟承认法国大革命令他们肆意渲染百年前法国的革命恐怖，其意图还是在于警醒国人并敦促朝廷变法图强，他们对于君主专制尽管有一定的限度，但毕竟为20世纪初年民主革命思潮的勃兴开辟了道路，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也了一些媒介作用。

二

从1900年到1901年，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出现于中国大地：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之役、《辛丑条约》不绝如缕。

中国是在空前的社会大动荡中迎接了两个世纪的交接，新旧两派的斗争日益激化并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相接，而新旧嬗代之词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期。）

隐藏在上述一系列大事件后面的，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悄悄的变化。民族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年有了初社团逐渐组成为阶级，废止科举、大兴学堂、留学热潮，又造就了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正是这些新兴社会新的眼光审视上个世纪末的一系列事变，并且认真进行历史反思。义和团的笼统排外，特别是那些愚昧而给国家带来极大的祸殃。就连曾经使人耳目为之一新的戊戌变法，它的失败也使人们对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洋人的朝廷”，君主在人们的心目中日益失去尊严。章太炎居然敢于公开骂皇帝是不识五谷杂粮的“小堂控告一家民间报纸，这只能导致它的威信进一步低落。

于是，继续维持皇室地位的英、日君主立宪模式迅速失去吸引力，而美、法民主共和模式则日益增诸

早在1901年，《国民报》即已公开宣传：“西谚有言：‘法兰西，革命之产地也。’今我中国二十倍运已渡太平洋而东，日本既稍受其福。我中国不愤不发，斯亦已耳；如睡斯觉，如梦新醒；于二十世纪而向，全球震惊，始而虎俄之专制为之倾覆，继而自由平等之实幸转移欧美。世界和平之极点将起于东方（《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

此后，法国大革命在中国的影响日益增长，对这次革命的热诚仰慕者日益增多。进步报刊以大量篇幅《民约通义》、《开智录》及《译书汇编》上连载的《民约论》中译本、杨廷栋的《路索民约论》全译本名而言，如卢骚之徒、卢梭魂、亚卢（亚洲卢梭）、平等阁主人、竞平、人权、民友、志革、血儿之类，有诗为证：“得听雄鸡三唱晓，我依身在法兰西。”（金松岑的长诗，载于《江苏》杂志第5期。）可见当

法国大革命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思想方面。

发表在《国民报》1901年第2期上的《说国民》一文，认为在君主专制统治下只有奴隶而无国民，为以自由平等的学说启发人民的觉悟。文章说：“法兰西革命以前，其民之憔悴于虐政者，非犹我今日乎？以有今日者，何也？盖以法国为国民之田，以十八世纪诸学士为国民之农夫，以自由平等之说为国民之平梭以至拉波波、罗伯斯比尔、丹东等人的名字，认为今日法国人民得以“食国民之果”，应该归功于他们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应该向美国独立战争的革命先驱学习，也把自己当作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弟子”，且波及于亚洲，波及于中国。

20世纪初年的中国，立志做法国“诸大哲”的弟子，努力播自由、平等之种子者大有人在。其中一人于1903年写成流传很广的《革命军》一书，热情奔放地歌颂：法国大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自居，并且极端推重他们的学说：“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人权学说，指出：“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谓君也，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游幸于平等自由城郭之中。”

与邹容齐名的陈天华。在《猛回头》中，也极为强调《民约论》的启蒙作用：“法国之人，……闻了争了起来。……一连革了七、八次命，前后数十年，终把那害民的国王贵族，除得干干净净，建设共和把那立法的权柄归到众议院来了，议员从民间公举。从前种种虐民的弊政，一点没有；利民的善策，件件有。”在《狮子吼》中，也有类似的言词：“当初法国暴君专制、贵族弄权，那情形和我现在在中国差不多论”，不及数十年，法国遂连革了几次命，终成了一个民主国，都是受这《民约论》的赐哩。”

长期接受西方教育的孙中山，最早接受民权思想并且最先提出建立民主共和的奋斗目标。他从理论到实践。同盟会从成立之日起便高举“自由、平等、博爱”旗帜，其宣言声明：“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之枢机耳。”

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在第1号，采用卢梭画像作为封面内页插图，并且称之为“世界之第一教仁声称：“吾愿此身为卢梭、福禄特尔（伏尔泰）”（《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万法精理》等书之后改名自由，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这些情况都说明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对中国这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除各种进步报刊广泛宣传法国大革命及其思想先驱者外，还有许多译著书籍专门所编《辛亥革命书征》，即有《卢梭魂》（1905年）、《路索民约论》、《译文四种》（1903年，内有《史》（1903年）、《法兰西革命史》（1903年）、《法国第一次革命之风潮》（1903年）、《法兰西近世等。此外，还有刘师培与林瀚合著的《中国民约精义》（1904年），分上古、中古、近古3卷，从中国古卢梭（即卢梭），考其得失”。这是沿用“西学中源”的手法，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某些相关言论来印证夏从夷”的忧虑，加速引进法国民主革命思想的进程。

第二，纲领方面。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邹容在《革命军》中最先提出以“中华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名；其政治体制是以法国为原型。

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演说，更明确指出：“法兰西民主政体已经成立，……同盟会的纲领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所谓“四纲”之中显然是以“创建民国”军政府宣言指出：“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以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段文字虽只寥寥数语，但却言简意赅，把《民约论》（General Will）的理论表述得相当清晰。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孙中山取道欧洲回国。他在巴黎答《巴黎日报》记者问，曾认为中国面积太大，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最相宜”。（《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2页。）但很快便发生变化。1911年12月30日，他为上海《民立报》题词，中文是“戮力同心”，英文是“‘Uni-ty’”（《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81页。）即已强调统一之重要。及至1912年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他所发表的宣言书尽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等语，但侧重点在于极端强调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美政治体制组成，而更接近于法国格局。南京临时政府所颁布的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由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并且具体规定了《民约论》人民主权、公意统治以及孟德斯鸠倡导的三权分立等原则，同时也借鉴了法、美政体实践的经

孙中山并未完全照搬法国大革命的经验，他力求结合中国国情将前人和外国的经验加以改造、融合与发展成为三民（民族、民权、民生）主义以外，又将“三权分立”发展成为“五权分立”。民族主义的排外与独立两种任务；民生主义的提出，则是由于企图预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避免贫富差别的过分悬殊，而是鉴于西方的议会政治与选举制度的弊端日益严重，所以在行政、立法、司法之外又分立考选、纠察制衡机制。孙中山说得很明白，考选、纠察两权乃是借鉴中国传统的科举与御史制度，企图抽取传统中的不足。

第三，策略方面。

在中国进行“与前代殊”的国民革命，因为是史无前例，所以只有向外国取经，而开头必然是向美国

首先是放弃戊戌变法谋求自上而下改革的温和办法，坚定不移地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

邹容在《革命军》第6章，明确指出：“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之心。”并且提出诛杀清朝皇帝，推倒北京野蛮政府等战斗任务。这里虽说是借鉴美国的《独立宣言》，为美国独立战争根本没有杀死皇帝的必要。而《独立宣言》的指导思想也是来自《民约论》，因为正是卢梭丧失，乃是由于被专制政府攘夺。如要恢复这些失去的权利、自由，就必须通过暴力直接从攘夺者手中夺

当然，孙中山从创建兴中会开始，就不断策动武装起义；但直至他流亡欧美，直接接触法国、美国革命民主革命的目标与武装斗争的手段紧密结合起来。

其次是一部分革命党人曾主张学习法国大革命，实行“中央革命”或“首都革命”。

早在1903年，张继在《祝北京大学堂学生》一文中，即已从起义地点的角度比较过“中央革命”与“地方革命”，并且对于孙中山等人领导的华南边地起义方略有所批评。他说：“观诸实际，欧洲之革命，由地

国，则革命之主动力量不在京城。悲夫悲夫！奄奄待死之中国，数年以来，革命之声日盛一日，孙文之贵前仆后继，流血淋漓，非不伟也，非不壮也，然吾颇疑其举近于地方革命。西人之行之，尚有难色者，以程也。吾望中央革命军之起，久矣。”（1903年6月6日《苏报》。）

以后，汪精卫到北京谋刺摄政主，出狱后又在天津成立同盟会京津保支部，而另一部分革命党人也表现出“中央革命”策略的影响，至少是谋求在首都进行暗杀或起义以配合南方革命军的北伐。

当然，孙中山也并非完全没有考虑过“中央革命”的策略，但是由于北京完全被清朝政府控制，当地动的凭借，因此很难照搬法国的革命经验。中国革命党人把活动的重点与基地放在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力量相对薄弱，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群具有一定的实力。辛亥革命的爆发及其进展，基本上是正确的，至少是有客观依据；而张继等人把“中央革命”视为不能更改的金科玉律，倒未免近于

再次是接受法国大革命的经验，以学生作为革命的原动力。（辛亥革命时期，人们往往把法国1789、

张继在上述文章中又曾强调：“学生为革命之原动力，而京都之学生尤为中央革命之原动力，是世界生、伯林之学生、圣彼得堡之学生，撞自由钟矣，杀皇帝矣，倒政府矣。世界革命之大风潮，该等学生之等学生之活剧台也。”尽管革命党人在“中央革命”还是“地方革命”方略问题上意见分歧，但以学生为杨笃生在《新湖南》一书中所说的“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云云，也主要是指具有新思想的学生。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早期侧重于联络旧式会党，而且不大注意宣传教育，所以旋起旋灭，影响甚微。别是接受新思想最快最多的留学生。设在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就是以留学生为主体建成的，随即又通过他们生，不仅充满革命激情，而且兼具组织与宣传两方面的才能，使同盟会的群众基础与思想基础都得到迅速样：“及乙巳（1905年）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之义，而传布中华民国的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支音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革命原起》，《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6页。）

由此可见，法国大革命对辛亥革命的影响是何等显著，但这不等于说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人们对于法国大

1905年夏天，正好是同盟会成立前后，康有为经由德国到法国游历，并于1907年出版《法兰西游记》法国大革命的酷烈恐怖，并且从根本上否定此次革命：“异党屠尽，则同党相屠；疏者屠尽，则亲者相屠就罗伯卑尔（罗伯斯比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一拿破仑之专制民主。然则所以

当时，梁启超未曾到过欧洲，更未曾亲履法国国土，只是在1903年在北美作过大半年考察，但他也有意义。他以加拿大与中南美诸国相比较，认为加拿大虽为大不列颠帝国的附庸，但其国民所享受的自由的民主共和国。由此他得出完全否定革命的结论：“彼法兰西以革命求自由者也，乃一变而为暴民专制，而六、七十年来未尝有经四年无暴动者，始终为蛮酋专制政体，求为美国之自由者，更无望也。”以后，《民报》激烈论战，继续坚持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而非民主共和，卢梭的自由民权学说不适合中国民情

但是，康、梁已经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立宪派声嘶力竭的驳论，终于未能阻止法国大革命影响的继续朝的土崩瓦解。“伤离念远何时已，捧土区区塞逝川。”这就是梁启超们无可奈何的叹息。

三

现在距离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已经整整200年，距离辛亥革命也将近80年，人们已经有可能超越党派成历史反思。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促进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但中华民国的建立并不意味着革命的完全胜利。“革命留弥留之际仍然为此抱终天之恨。

从20世纪初年开始，在半个世纪左右的岁月里，中国一次又一次进行着革命斗争，包括“二次革命”法战争、第一、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等。这些当然都是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但不能完全排除意也包括遥远的法国大革命的某些潜在影响，尽管它并非唯一、更不是主要的外来影响。

为了反抗侵略者和本国反动统治者，特别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暴力革命在磨灭的功勋，起了应有的伟大历史作用。但是，长期的连续不断的革命斗争，加上深入人心的充满激情而渐凝固的传统观念，即革命高于一切，革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手段。以后，由于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神圣，手段变成了目的，历史除了革命便别无其他内容。

革命因此成为社会行为的规范，价值评判的标准，不仅是政治评判而且还包括道德评判。也正因为如法宝，他们可以用革命的名义满足自己日益膨胀的权势欲望，或则是以反革命的罪名来处置那些可能威胁定为“罪大恶极”的无辜平民百姓。这样，革命便走向自己的反面。

当然，不应把这种极端扭曲的社会现象归咎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它毕竟产生于中国的历史社会土壤

济、文化条件的限制，法国大革命在辛亥前后对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相当有限的。它的影响并未普及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精英群。即令是社会精英群，认识层次也不尽相同，多数只限于情感激动层次，真正解也并非确切。这是由于中国的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瓜分亡国的威胁迫使广大群众不断奋起抗争，同时也准备的情况下便被推上革命领导地位。他们率先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并且期望有更多的追随者为民族解必然是民族（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而个人利益（直至生命）必须服从民族（革命）利益。这种宣传，而且也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民族的解放（或阶级的解放），也就没有个人的解放。但是，这样长期的以致使中国的民主思想启蒙受到很大局限。